

# “诗歌是我对人生最美好的答复， 诗歌让我处于孤寂而享受孤寂”

——访台湾诗人绿蒂

□绿蒂 宋晗

宋晗:绿蒂老师您好!很开心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见到您。我在搜索整理资料时发现您创办过许多刊物。

绿蒂:对,因为我从18岁开始一直到80岁都在做这个工作。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作《十八·八十》,不光是回忆过去,我想表明这一条路我一直在坚持,不管是做编辑、编刊物,或者是自己的诗歌写作,还有做两岸文化交流工作,我从来都是没停顿过的。我就想在这条路前行。

宋晗:您从开始办刊到现在,您的办刊宗旨或者心意是什么?

绿蒂:当初比较年轻,刚开始办刊的时候才二十几岁,因为在台湾要办刊登记一下就可以,我主要的想法就是,文学应该超越疆界,尤其对于大陆和台湾而言,同文同种嘛,看的都是同样的东西,我们向往的也都是相同的,尤其像对屈原、李白、杜甫这些大诗人的崇敬都是一样的。两岸是共通的。文学的永恒性很高,历经了多少朝代到现在,还会有很多人记得李白、杜甫的皇帝是谁吗?我们都不大记得帝王是谁了。但是我们会记得这些诗人,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所以我认为文学的功能也在这个地方。

宋晗:我读了您之前的许多采访,有一些诗歌评论家在点评您诗歌时会提到“乡愁”,但我知道您就出生在台湾。

绿蒂:对,但我的祖先是来自福建过去的。

宋晗:诗歌评论家会用“漂泊情怀”这种说法,您怎么理解?

绿蒂:所谓“乡愁”,其实离开五里路和离开千里路是一样的。你只要有这个感觉,“乡愁”就是对“根本”的一种情怀,是对“文学根本”的情怀,这才是我真正的乡愁。乡愁呢,爱情呢,都是文学家永恒的主题,多少年来,这依旧是许多人写作的主题,不会变的,不会因为时空环境的影响有所改变。余光中先生也是写乡愁,写的就是文学根本意义上的乡愁。

宋晗:您现在是在台北居住?

绿蒂:是的,我现在在台北工作、居住,我们也有一个文艺团体,是社团法人,不过和作协、文联一样,我们协会也有舞蹈啊戏剧啊电影啊这些艺术门类。

宋晗:到台北后,您还会经常回故乡吗?

绿蒂:有回去。像我有两个故乡嘛,一个是我到福建晋江去寻祖,在台湾的故乡是一个乡下,我读小学的地方,叫云林。不管怎么样,在我现在去看,为什么当时觉得很大的地方现在发现它很小,它所有的景物好像都缩小了,人物也模糊了,这是时代的变迁使然,但拥有一份怀念是不会消失的。

绿蒂,本名王吉隆,1942年生,台湾云林人。现任中国文艺协会理事长,《秋水》诗刊发行人,《文学人》杂志社社长;曾任《野风文艺》主编。创办了《野火诗刊》《中国新诗》以及长歌出版社。1986年获颁美国 World Academy of Arts and Culture 荣誉文学博士。1998年获得日本创价大学颁赠荣誉成就奖。2002年及2007年由中国作家协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绿蒂作品研讨会”。2003年担任在台北举行的第23届世界诗人大会会长。2004年以诗集《夏日山城》获中山文艺创作奖。曾获韩国第30届世界诗人大会颁发的“桂冠诗人奖”等国际诗歌奖项。曾应邀出席第七、八、九、十届中国文联全国代表大会。出版诗集《蓝星》《绿色的雕像》《风与城》《云上之梯》《泊岸》《坐看风起时》《风的捕手》《孤寂的星空》《存在美丽的瞬间》等二十余册。

宋晗:您在乡下读书的生命阶段后来有没有滋养到您的写作?

绿蒂:那是当然的,我出过一本诗集叫《北港溪的黄昏》,我就写我的故乡,当时的小火车什么样子啦,妈祖庙什么样子啦,写小时候的天地很大、现在看起来很小的这种感受。我总想说,它们是一脉贯下来,就像我写诗,出了十几本诗集;有时候我会想,我根本就是在写同一首诗,我人生就像一首永远写不完的诗。但是呢,每首诗,我又想让它们形态不一样,我主要的诉求不外是“爱”,不外是“和平”,不外是这些观念。我觉得现在人类应该慢慢能够达到,这当然是理想嘛,我们期待“世界大同”,也就是说世界不应该有这么多隔阂,彼此去尊重文化,不是用一方的文化去强加给另一方。

宋晗:您也谈到过诗歌翻译,谈到诗歌的节奏感、音乐性,包括美感。

绿蒂:诗歌翻译比较困难的,不管是外文翻中文,还是中文翻外文,只能是意思到了,就像散文会好一些,诗歌的节奏是很难翻译出来的。真正诗歌的意境要是能翻译出来,那译者就是高手中的高手。因为一首诗常常不是表面上我们所看到的,它另外有它的含义跟境界,我觉得这些方面是常常翻译不出来的。

宋晗:还想和您聊聊现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在网络上写诗。您之前也留意到了。

绿蒂:对,网络发达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过去大家写作没地方发表,即使大陆有这么多刊物,台湾有这么多诗刊,能被刊登的几率还是很低,因为我当编辑嘛,常常会遇到这样的事。网络上呢,作者可以自己贴上去,好的作品也会被流传。但是有一

个不好的,我认为说应该有个过滤,有个版主去检查不当的批评,因为有些批评直接贴上去也显得不公允,不经辩论就下判断说你就是这样子。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平面媒体呀书呀还是不会被取代,我们读一本书,可以放在书架上,随时可以拿出来看,跟打开电脑去读作品,这个温度是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就像文学馆在做手稿的保留这些工作,都是很有意义的。

宋晗:您最喜欢的汉语诗人是谁呢?

绿蒂:我比较喜欢的是杜甫。当然也不是说我不喜欢其他的,我觉得杜甫的经历让他的作品有更多样性的变化,诗人一定是在表达他自己的人生嘛,一定有他的不同议题来丰富他的创作生命。就像说,我喜欢旅行,去一个地方不是说具体向往什么,但一定要赏识这个城市,我一个人坐在孤独的咖啡厅,没有任何我认识的人在那里,我可以很好地体会那种异乡的感觉。我参加过许多交流活动,几十年来,大陆各省差不多都走遍了,但因为地方很大,不一定每个城市都走得了。就像云南,我去丽江、西双版纳呀,去大理,都有不同的感觉。只有去到那里才会有具体的体会。要是没有去新疆,我不会想到新疆的土地面积是台湾的46倍,更不会着迷于喀纳斯的美景。

宋晗:您会阅读大陆当代诗人的作品吗?

绿蒂:当代诗人的交往也很多,但我也不能轻易下评断。从诗的源头论,台湾的诗是大陆这边带过去的火种,当时还偏向抗战诗歌啦。但因为历史原因,台湾比较早接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比如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的影响。后来,台湾也把诗歌带到大陆产生一个双向交流,比如郑愁予、席慕蓉、余光中、洛夫,我都跟他们来访问过大陆。当然了,现在大陆和台

湾都有更新一代的诗人兴起,我说的是比较老旧的,不过文学呢,其实是没有新旧的,好作品会一直留下来,一时哗众取宠的,过了这个年代,就不见了。

宋晗:那您青年时代写诗,和您现在80岁写诗,有什么不同?时间对您意味着什么?

绿蒂:岁月带来的阅历跟眼界,会让人生体会不同。一路走来,我再看我18岁的作品还是略显不成熟的,但是别人说那你要修改吗?我说不愿意。那些作品代表了那时候的情感。到现在,写的诗会有点怀旧,我写了一首诗说“也许老了”,其实是真的老了,我也希望把自己这种老了的的心情表达出来。这是没有办法的,岁月会不断朝我们而来。

宋晗:岁月会让人生更丰富。

绿蒂:是,更丰富了。我有一首诗表达说我在梦里的时候,上帝问我,你现在80岁了,我让你回到18岁,但是呢,这些阅历统统没有了,你愿意不愿意?而我的答案还是不愿意。我说80年了,不管是艰苦、困难或者贫困,我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这都是我人生的痕迹,都是我值得的,是值得存在的。

宋晗:有大陆学者研究您的诗歌的时候,提出一个说法,我觉得特别美,这个说法是“静者心多妙”。这个说法很美好。和您谈话我也觉得很宁静,很睿智。

绿蒂:写诗让我的人生美好,是因为我享受诗的孤寂。诗歌的孤寂让我处身其中不觉孤独,诗是我对人生最美好的答案。我想说,如果有人问我这一生有什么?我会说是诗,诗有100种解法。乡愁也是诗。



绿蒂

## 鲁迅传播与两岸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升华

——序徐纪阳《鲁迅台湾传播的史料整理与研究》

□朱双一

学或谋生,而与鲁迅有了交集。在特定年代,两岸之间的鲁迅传播还开辟了一条有点别扭但意义特殊的日本途径,并由此增添了许多意义深刻的“故事”。最典型例子是1938年5月,因同情贫苦阶级而资助过杨逵的日本警察人田春彦自杀并留下遗书托付后事给杨逵夫妇,遗物中有日文七卷本的《鲁迅全集》,杨逵得以较全面阅读鲁迅,这才有了台湾“光复”初期由他领衔翻译出版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故乡》《孔乙己·头发的故事》《药》等中日文对照的鲁迅作品集。其他最具代表性的台湾作家赖和、龙瑛宗、锺理和、陈映真等,也都深受鲁迅影响,在本书中有专门的论述。由此可知,认定台湾乃“东亚鲁迅”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节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充分的历史事实依据。

当然,纪阳也充分认识到,尽管鲁迅话题在东亚日益成为一个区域整合性课题,但不同国家和地区却是从自身历史深处的问题意识出发而接受鲁迅的;即使是同一个地区,也有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台湾与祖国大陆共同经历过被侵略的遭遇和同属命运共同体的事实,使其鲁迅传播和接受,有着鲜明的中国印记。阅读此书,给我最大震撼和感动的,是日据时期台湾作家认识到台湾与祖国命运与共,从而将摆脱殖民统治的希望,寄托于祖国的胜利和强大。这不是宣传口号,而是从他们的生命中生长出来的信念。整个20世纪,除了光复初期的宝贵五年外,前有日本殖民占据,后因“冷战-内战”交叠构造而造成两岸长期阻隔,鲁迅无形中成了两岸作家乃至两岸同胞情感连接的纽带。他们见到鲁迅或读到鲁迅作品,往往如同见到了祖国母亲一样。1926年张我军在北京拜访鲁迅并赠送四册《台湾民报》,见面时张我军一句“中国人似乎都忘记台湾了,谁也不大提起”,让鲁迅就像受了创痛似的,口上却道:“不,那倒不至于此”,只因内忧外患,自顾不暇,“所以只能将台湾这些事情暂且放下……”并在第二年为张秀哲所译《劳动问题》作序时称赞道:“正在困苦中的台湾的青年,却并不将中国的事情暂且放下。他们常希望中国革命的成功,赞助中国的改革,总想尽力于,于中国的现在和将来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还在做学生。”其实,相似的一幕早在1907年林献堂和梁启超的日本奈良之会中发生。无论是梁启超对于林献堂,或是鲁迅对于张我军、张秀哲等的回答,都如实反映了祖国同胞何尝忘记台湾,只是整个

民族正面临亡国灭种危机,只能将救亡图存作为首要任务,只有整个国家战胜外敌,获得民族独立,台湾也才能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新生。这正是两岸命运共同体具体表现,两岸作家的交往,特别是台湾作家对于鲁迅的喜爱和崇拜,也正是这种意识和心情的体现。按照勃兰兑斯的说法,文学史的最深刻含义是心理学,本质上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的历史。本书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鲁迅在台湾传播和接受史的关键。

台湾作家以鲁迅为连接纽带而达到对两岸命运共同体认知,以龙瑛宗、锺理和等作家最为深刻。本书概括了台湾几位最重要作家的鲁迅接受的不同特色:

赖和主要将鲁迅的白话文作品作为一种新的文学语言的典范来学习;杨逵以鲜明而坚定的左翼立场继承了鲁迅“敢打又敢骂”的现实战斗精神;而陈映真则继承了鲁迅精神中反抗政治权力、批判社会现实的一面。龙瑛宗的特点是经由日文渠道接受鲁迅作品中的中国文化精神,同时对日本右翼的鲁迅观做了左翼转化,造就了自身思想中独特的“祖国”文化结构。龙瑛宗原本偏爱佐藤春夫唯美清朗、忧郁感伤的作风,并因此而接触到鲁迅文学,而殖民地生活的悲惨境遇促使他与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亲近。但是,“被局限在小知识分子信心不足视野里”的龙瑛宗无力作出有效的反抗,只能悲哀地感慨“帝国主义的枷锁缚住我的手脚”,最终选择“在文字领域中自由地幻想与飞翔来治疗殖民地生活的苦闷”。文学成为龙瑛宗理解“中国的命运”的首要方式,这一点与陈映真“偷”读了《阿Q正传》而认识到中国是自己“苦难的母亲”并建立起永世不移的中国认同相似。龙瑛宗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兼具忧郁的作品风格和笔下那些颓废萎靡、无路可走的人物,无形中揭示了殖民地的现实。尽管西川满欣赏龙瑛宗表面上的浪漫色彩和颓废,却无法理解被殖民者与之内心上的根本冲突乃至命运的根本分歧,与祖国同为被侮辱、被损害、被殖民者的共同命运,使龙瑛宗与鲁迅、与现实主义、同时也与祖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明确写道:所谓外地文学并非以本土(按:指日本)的文坛为进出之志或模仿本土的文学,“外地文学的气性不是乡愁、颓废而该是生长于该地埋骨于该地者热爱该地为提高该地文学而作的文学”。

另一个特别的例子则是锺理和。根据本书的

由此深刻认识到两岸具有遭受外来殖民以及抵抗奋斗求解放的共同命运,为避免重新沦入被殖民深渊,才会反对分裂,坚定地追求国家统一。

1949年后,除了随国民党赴台的部分大陆文化人仍延续着贬鲁控鲁外,对于广大民众,鲁迅及其他30年代的文学成了禁书。然而鲁迅的光芒毕竟无法遮蔽,青年学生反而越禁越想“偷”看,越觉得认真,记得牢,这大概是施禁者始料未及的吧。几乎成为奇观的是1970年前后的赴美留学生,到了美国后,首先寻找“禁书”看,鲁迅的名字及相关话语、词汇不断出现在当时的保侨刊物上,这就为“钓运”向“统运”转变以及随之兴起的海外华人“新中国认同”热潮,打下思想基础;也为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批判美、日新殖民主义以及提出与鲁迅“弱小民族论”紧密相连的“第三世界论”提供了思想资源。岛内的“冲破堤防”,则要到1980年代的“解严”前后,1989年下半年的短短半年中,台湾三个不同出版社“争先恐后”地出版了三套《鲁迅全集》。近40年来,由于工作关系,我与台湾学者、作家接触和交流颇多,均经常向我透露在戒严时代曾暗中阅读鲁迅作品,并多少带些引以为傲的夸耀之意。一些台湾作家、学者到了厦大,就直奔鲁迅纪念馆而去,我在陪同他们参观时,目睹了他们参观时的激动心情。蔡源煌所说“虽然鲁迅的著作在台湾查禁了整整四十年,但大多数生活在台湾的作家心中都有某种‘鲁迅情结’”,证之我自己的观察,深信此言不诬。

本书作者纪阳为人诚恳低调,不会为自己“打广告”,但却一步一脚印地在坚实土地上向前走着。我很庆幸他成为我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生,从而为接踵而至的师妹师弟们做了表率,开了个好头。以前常与学生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多乃是应景或鼓励之语,心里想的是“胜于蓝”哪有那么容易?阅读了纪阳这部著作,每到精彩之处,拍案叫绝,深觉“胜于蓝”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当然是我所乐见的。



夏荷 海宁摄

華馨

朱双一

HUA XIN